

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金科玉律

——《何兆武思想文化随笔》序

▶ 何兆武

5月28日上午，著名历史学家、思想文化史学家、翻译家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/思想文化研究所何兆武先生在北京逝世。

本文为《何兆武思想文化随笔》（科学出版社，2012年）一书的序，先生在文中说：“思想总是不断在变化的，一切成熟的东西都是从不成熟的状态中生长出来的。任何思想不可能是一旦出现，就成为永世不变的金科玉律。”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仅以此文重温先生的思想，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何兆武先生。

本书汇集了自己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关于历史、哲学和文化的随笔。它们大多围绕传统社会如何走向现代社会的主题展开，是一些零碎感触的积累，并非什么成熟的结论。也许，正由于不成熟，才成为其存在的理由。

因为思想总是不断在变化的，一切成熟的东西都是从不成熟的状态中生长出来的。任何思想不可能是一旦出现，就成为永世不变的金科玉律。即如马克思，他的思想基本定型于19世纪下半叶，迄今已经将近一个半世纪了。假如他仍在世，会不会完全认同他一个多世纪以前的那些思想观点字字是真理呢？

历史是不断进步的，历史所形成的任何思想也都是在不断演进着，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金科玉律。

毛泽东要求翻译的《西方哲学史》

我原来没有写书的计划。在20世纪50年代解放之初，也还没有自己应该研究些什么的想法。后来想做点研究，但因为水平不够，没有写文章，只翻译了一些书。

50年代初期还曾翻译出版过两本苏联的小书——《太阳系的结构学说》和《自然之谜》，都是通俗的科普读物。当时的学术环境比较特殊，凡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西方著作可以公开出版，凡是马克思主义以后的西方著作只能内部发行。我刚好在外文书店买到一本法国新版的卢梭《社会契约论》。这本书引用的参考资料丰富，引文资料完整，参考文献也很全。我很喜欢这本书，就翻译出版了。后来也想翻译些别的著作，可是当时的运动很



何兆武（1921.9-2021.5.28）原籍湖南岳阳，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，并攻读哲学与西洋文学研究生，1946年毕业。先后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，1986年后任教于清华大学。译作有卢梭《社会契约论》、帕斯卡尔《思想录》、康德《历史理性批判文集》、罗素《西方哲学史》等，著有《历史理性批判散论》《历史与历史学》等。



2020年1月，学林出版社再版《何兆武思想文化随笔》，分成历史、文化、哲学、读书四册

多，基本上没有时间干点想做的事，只能晚上回家偷暇，种一点“自留地”或称开“地下工厂”。

一次，商务印书馆找我翻译罗素的《西方哲学史》，却有一段有趣的往事。我喜欢看罗素的书，但当时并不同意他的一些观点，也不知道此书的来历。可是翻译这本书，却成为我“文革”时被定性为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的终审“罪状”——即“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”。那时候的准则是，不问真相就可以给人扣上帽子肆意批判。“文革”后，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骆静兰女士（她是我的同班同学，“文革”前有来往，“文革”后恢复联系）告诉我，《西方哲学史》一书是毛泽东交译的。原来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罗素和爱因斯坦两人组织了“世界和平运动”，反对美帝霸权主义威胁世界和平。运动很红火，我国也很欣赏。毛泽东和周恩来遂联名致电罗素，邀请他来中国访问。当时已经97岁高龄的罗素也已答应来华，他在“五四”时即曾经到过中国，并待了一年，颇有影响。可是临上飞机时，他因年事太高不能乘机，终于未能来。于是，他就把这本书送给毛泽东，毛泽东遂交待下面翻译出来。当时凡是翻译外国的著作都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商务印书馆遂找到了我，因为我曾为他们翻译过书。但是他们并没有告诉我这本书是毛泽东交译的。

罗素的《西方哲学史》是我翻译的第二本书。此后，我曾在“地下工厂”偷偷翻译过我比较欣赏的几本书，其中包括帕斯卡的《思想录》和康德的《历史理性批判文集》。期间也翻译了一些比较薄的书，如卢梭的《论科学与艺术》《社会契约论》，康德的《论优美和崇高感》，还译了孔多塞《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》。由于我对历史理论感兴趣，又译了柯林伍德的《历史的观念》、沃尔什的《历史哲学导论》、布莱德雷的《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》、梅尼克的《德国的浩劫》以及编有《当代西方史学理论》等。梅氏是当代德国史学大师，这本书是讲希特勒的，普通人以为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是德国德意志民族的一种偏激产物，但他认为这完全是一个偶然的事件，并不是德国文化的主流。

后来中国科学院历史所（注：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）侯外庐先生主编《中国思想通史》，我参加写宋明理学部分。当时还有几位没有摘“516”（即反革命阴谋集团）帽子的同事，就不能参加这项工作，不能参与写《中国思想通史》。他们不服气，便另起炉灶，另写了一本《中国思想发展史》（是我起的书名），他们也邀我参加，结果我变成了“两面派”。《中国思想发展史》写成后，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。外文出版社当时正在做一套对外介绍中国文化的丛书，

看到这本书后，就想译成外文出版。我们也很高兴，就同意由他们翻译。国内翻译界的译者往往只懂外语，不懂专业，他们后来翻译不下去了，就要求我们自己翻译。这本书四位作者，有三位是解放后毕业的，没有学过英文，只有我是解放前出生，学过一点英语，所以他们就推我来译。我花了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，不是严格地逐字逐句翻译，而是边译边写，有增有删，并不完全是译文。这本书出版之后，外文社又找我写了一部《中国古典哲学发展史》（2009年出版），这是与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钢两人合作的。

中国封建社会时间长是个假问题

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历史学的书，不是讲历史，而是讲历史学。现在还没有写，以后也许没有精力写了。

历史学界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——明明要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历史观，可是所写的历史著作中却处处都在以西方的观点为坐标。例如，根据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，到处去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。明明反对西方中心主义，却处处套用西方中心论来衡量中国的文明。我想应该有一本讲历史学的书，来回答这个问题。

有些历史学家反对西方中心论，可是他们却往往是以西方为标

准来衡量中国。他们总是问，中国封建历史怎么那么悠久？这是一个典型以西方封建历史为标准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。既然反对西方中心论，为什么又要以西方的尺度为准来衡量中国呢？为什么不用中国的尺度为标准，那样的话这个问题就会反过来了，为什么西方的封建历史那么短？为什么不从这个角度去研究这个问题？为什么只研究中国封建历史的长期性，为什么不讲西方封建社会的短暂性？关键在于以什么为标准。实际上，这些历史学家口头上反对西方中心论，但脑子里却是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。像中国封建社会时间为什么那么长这样的问题，其实是个假问题，根本就不能成立，因为这是用西方封建制历史作为标准。

历史学界热衷于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，西方有资本主义，中国也非要有资本主义不可吗？这不是研究历史，而是想要化解心理上的疙瘩——我们也得有资本主义，至少是萌芽。我觉得这是心理学的问题，而不是历史学的问题。这是因为学者有心病，总以西方为标准。

其实我们应该研究中国如何走向现代社会这一普世的道路。不要总强调中国的特殊性，因为普遍性终究是第一位的，而特殊性是第二位的，不能用特殊性来否定普遍性。我们可以研究，为什么近代科学出

现在西方？西方比中国先进一步，就是因为他们先有了近代科学，而中国一直到清朝末年才真正地接触到近代科学。

近代科学17世纪就在西方开始出现，中国到20世纪初叶才真正接触到近代科学。近代科学本身并不分东、西，只是西方更早地发现并应用近代科学，而我们却老是把近代科学放在“东”“西”的框架里边来理解。科学是不分东、西的。学术研究也像经济发展一样，不能只追求数量，不求质量。数量多而质量低的学术对人有什么用？对社会有什么价值？对文明又有什么贡献？总跟人家比，实际上会把自己引到歧路上去，而找不到通向现代化大门的钥匙。

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，直到五四运动才总结出两面旗帜即科学和民主（德先生和赛先生）。如果仅从字面上，现在大家都熟悉科学与民主，可是做起来为什么又这么困难？因为我们没有真正走上科学与民主的道路。例如大跃进时期亩产多少斤就取决于你胆子的大小。这些不符合科学规律的做法，结果把社会经济搞颠倒了，甚至还有著名的科学家去论证亩产万斤的可能性，当时这样做论证可以理解，因为在当时的气氛之下，人们不能反对，只能赞成。全国大跃进，就表明缺乏科学、缺乏民主。没有人听到农民直接说，亩产没有

几万斤。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家，有那么多农民，就没有听说哪个农民反对。这一点从反面证明了科学与民主之间的密切关系。如果大跃进时真正讲民主，就不可能造成后来饿死那么多人的大悲剧了。

当国情和真理不相符时，需要改的是国情而非真理

关于明末清初传教士对中国近代科学所起作用，一些研究者似乎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。当近代科学已经萌芽的时候，天主教教士来中国是传授中世纪的宗教教义，他们并没有近代科学知识，近代科学在中世纪宗教徒看来是异端邪说，从布鲁诺、哥白尼到伽利略这些近代科学的奠基人都受到宗教的迫害。因此，对传教士的作用不能够评价过高，从传教的角度来说他们有功劳，但对于科学和文化的近代化而言，这些传教士所做的工作并没有积极的价值。

近代世界的主潮是科学与民主。那些来华的传教士是要传中世纪的宗教，跟近代科学和民主没有关系，他们都反对近代科学，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中国所需要的近代科学与近代思想，所以他们对于中国的近代化没有贡献。直到“五四”时期，我们才真正直面现代社会的两面旗帜——科学与民主。

要走向现代社会，就要接受普世性理念的价值。普世价值就存在

于现实生活中。学术具有普世价值，放之四海而皆准。学术的目标是追求真理，所以不存在东方和西方的差异。不应该强调学术有中西之别。都是学术，就只有对错、精粗与高下之分，但并不是中西之别的问题，将它归结到中西文化之不同并不妥当。人道主义也是古今中外都应该遵守的。保障人权，实行人道主义，就要尊重人，体现人的尊严就是普世价值。科学也具有普世性，要尊重科学，服从科学规律。科学一视同仁地为任何阶级、任何时代、任何民族和国家服务。2+2=4 不分古今中外，万有引力定律是所有的民族和所有的阶级，都应遵循的科学规律。每一阶级都要服从和利用科学，所以无产阶级政治也必须服从科学。不服从科学，就会受到科学的惩罚。要使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，无产阶级政治就必须首先尊重科学。如果缺乏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普世价值，就会导致对人的不尊重，对生命的不尊重。

中国要走向现代社会，要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。“文革”时期，人们每天都要“敬祝万寿无疆万寿无疆”“敬祝永远健康永远健康”。人总是要死的，怎么能万寿无疆？怎么能永远健康？这些都不是科学，不科学就是迷信。只有封建帝王才叫万岁，可是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一个享年万岁的皇帝，不要说万岁，连百岁都没有。年纪最大

的就是乾隆也仅只活到89岁。

民主是近代文明的一大贡献，其作用是能够约束权力的绝对化，使权力能最大限度地使用在正确的方向上。绝对权力而不受约束是非常可怕的。当朱元璋是乞丐时，有一碗剩饭给他，他就会满意了。等到他做了皇帝，就大开杀戒，一次残杀就是几万人。蓝玉是他手下大将，杀害蓝玉时，诛连了八万人。他的儿子明成祖杀方孝孺时说要诛他九族；方孝孺毫不畏惧地说，诛十族都不怕。明成祖果真开辟了杀人历史的新纪元，把方孝孺的十族都诛了，什么亲戚、朋友、学生统统都杀害了。朱元璋做乞丐时没有这个能力，也不会有这个想法。等到他做了皇帝，享有绝对权力，就可以作威作福，为所欲为了。西方出问题也出在不科学、不民主。前车之鉴如德国。德国科学很发达，但不民主，结果出现了希特勒那样法西斯的独裁统治。

社会进步需要科学和民主。自近代科学问世以来，它为社会发展提供空前强大的生产力，使人类社会的经济建设和物质文明大踏步提高，但在文化思想方面进步并不太明显。现在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，例如贫富悬殊，两极分化。这在任



何兆武先生 2011年在清华寓所

何社会都是很危险的事情。但现在并没有很好的办法消除贫富差距。两极分化继续加大会导致社会正义和公平的缺失。所以中国现在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需要科学和民主。

1940年代国民党常以国情为借口掩盖其庸政和腐败，《大公报》有时就打点擦边球。我记得有篇社论的标题是《贵顺潮流而不贵适国情》。意思是说，我们重视的是要符合时代的潮流，而不是要适合中国的国情，或者某国的国情。因为国情是人造的，是可以改变的。真理不在乎它是否符合国情。假如它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话，那么要加以改变的是国情，而不是要改变真理。国情要适合真理，而不是真理要适合国情。

这本书只是一家之言。虽然只是些浮浅的文字，却也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、反响和指正。

作者谨记

2011年5月清华园